



CHENGWENBING NIANPU

程文炳

年譜

李兴武 著

黄山书社



程文炳年谱

李兴武 著

CHENGWENBING NIANPU

该著作受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皖北文化研究中心科研基金资助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文炳年谱/李兴武著.—合肥:黄山书社,2011.12

ISBN 978-7-5461-2345-5

I. ①程… II. ①李… III. ①程文炳(1833~1910)
—年谱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8643 号

程文炳年谱

李兴武 著

出版人:左克诚

策 划:赵国华 汤吟菲

责任印制:李 磊

责任编辑:侯 雷

装帧设计:钱志刚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0551-3983516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75

字数:230 千字

版次: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978-7-5461-2345-5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程文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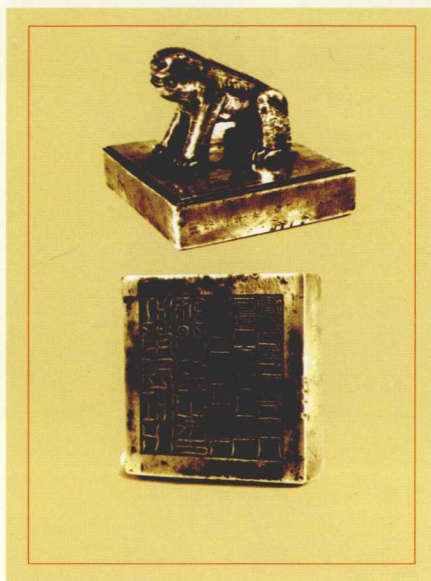
程文炳朝服像



颍州壮勤公程文炳将军肖像



程文炳（右二）光绪年间与李永芳（左二）等人合影



清江南長江水師提督之印



程文炳光緒三十二年（1906）奏摺



宣統二年（1910）程文炳去世后皇帝上諭



程文炳宅院内静乐堂



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阜阳程文炳宅院

代序：近代地方历史人物研究的新突破

——简评李兴武之程文炳系列研究

陆志成

所谓“程文炳系列研究”，盖指《程文炳年谱》、《程文炳文集》和《程恩培集》之中，以程文炳的史料为引领，涉及其二子程恩培的《东瀛官兵纪事》与其三子程尧章集案并译述的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法律法规和典章制度的专著《日本变法次第类考》，四子程恩普等五兄弟被誉为“安徽辛亥英杰”，追随孙中山，效力同盟会，发动皖北（阜阳）首义的事迹，还兼及对“程门三提督”（程文炳、程允和、程之伟）和近 20 位“程氏历史名人”的钩沉，实为一项庞大的系列“工程”。

已问世的这 100 余万字的“晚清稀见史料”，自当属于近代地方历史人物研究范畴，但在观念和方法上有几点新的突破。笔者于《程文炳年谱》即将付梓之际，在此提出初步意见，借以就教于兴武君及诸位方家和读者。

一、突破重“文”轻“史”的学风

在我国不论是论史者还是读史者，多不顾史实之真实，只看重史书之文笔。此马、班、欧阳、范蔚宗之所以尤受推崇。即使为人们所称道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中也存在有因追求“传奇”，或因囿于偏见，而发生的于史无据，张冠李戴的错讹之处。但人们并不深究，甚至视而不见，只管陶醉在华美的艺术

欣赏之中。如此以文学掩盖史实者，比比皆是。比如《三国演义》之于《三国志》；比如岳飞之于刘锜；比如赞美《醉翁亭记》者无视欧阳修受诬遭贬之忧愤之情；比如欣赏“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的“奇采”、“奇调”（纪昀语）时，由于不了解苏轼为“拒开八丈沟”而亲到淮颖水上步步“丈量”的辛劳和繁忙，反而把“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解释为苏学士醉酒颖上风流嬉戏之为，实在是南辕北辙。其他等而下之的一些完全不顾史实、胡编乱造流行于世的“历史剧”，还甚至被捧为所谓史诗精品。其实质上在酿造着混淆历史误导大众的恶果。因此，笔者以为，历史研究之重在于史料记载之真实，若能文笔优良，记事翔实，二者兼得，当为上乘之作。若不能达此者，宁略去华丽的文采，亦应追求其质朴的真实，切不可为文造史，因辞害意。考之于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虽无斑斓奇伟之语，然其考证之翔实，却经得起历来“考异”者之验证。所以被视为学者的楷范。今观李兴武的程氏三书，可以看出他走的正是“考评翔实”之路。比如其中程恩培的《东瀛官兵纪事》，径直是两个月的流水账式的日记，却使我们直观到日本军事演练、军事教育、军事后勤的种种细节，虽无宏大的叙说和张扬的评论，然其启发和借鉴的功用自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其中《程文炳文集》几乎全是凭着109道奏折、36通电文、4封信札、5条档案组合而成，可以说几乎“无文”。

但是这些并不表示李兴武轻视“文采”，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不吝惜笔墨。比如附在本年谱之中的《清末大吏程文炳》一文，布局谋篇错落有致，其间7个小标题颇具“骈体”格制，文思甚是巧妙。其语言文字也张弛有度，“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绝无玩华坠实、哗众取宠之态。

二、突破重“大”轻“小”的观念

此中之“大”与“小”，乃“大人物”与“小人物”之谓也。就是

指只重视或钟情于对“大人物”的研究与捧场,而忽视或不屑于对“小人物”的发现与开掘。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人物研究多是大而化之,学者专家们的注意力也仅止停留在人们所熟知的“大名头”的所谓一流人物身上或尤不屑一顾那些地方小人物。年年老课题,篇篇炒剩饭。历史人物研究路子越来越窄狭,历史的表述越来越教条,越来越僵化,也越来越没有新意!于是出现了重复课题,人云亦云。比如时下热炒的李鸿章,相当一些为文者,不在深挖史实上下苦功,只在道听途说上搞投机,以至虚设假造,捧场过头,矫枉过正(翁飞语)。何至如此?“研究”名人出名快也!君不见,一部又一部大同小异的名人传、评、论,造就出多少著名学者、著名作家啊!又有谁见专家、学者、教授的桂冠,何时光顾过研究地方“小人物”者?由于,地方人物的开掘发现常常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稀缺,收效甚微,甚至会劳而无功。加之缺乏政策的支持和财力的投入,致使研究步履维艰,冷清落寞,人们更少涉足了。即使幸运地淘到一些史料还要挖掘钩沉,八方搜寻,尤要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比如李兴武在2007年发现一本诗集《拙庵诗草》,署名“程恩培”,但由于其中的地名“光山”引起疑问,留心追求至2010年发现《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从其中记载才验证这本诗集竟是与颍州程恩培同时同代同姓同名的“光山”人所作。虽甚感可惜,却在正式出版前毅然割爱,于是三年辛苦废于一旦。说到“创见”,当推他的“皖军”说,他在史料梳理过程中,发现程文炳所率部队既不受曾国藩、李鸿章的“节制”,也不属湘军、淮军系列“编制”,应当是一支“独立”的“皖军”。他的创见得到淮军史研究专家翁飞的充分肯定,从而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其实对地方史和地方人物的研究,在我国历史上是久有传统的。至晚始于东汉《史通·杂述篇》,延之有《隋书·经籍

志》，以至唐、宋、元、明、清代均有所著。这些研究既为独立之史书，亦可备“国史之采摘”，可为国史的补充。地方小人物同样反映大时代。比如常为人称道的“睁眼看世界”者，其实并不只林则徐或现今热议的李鸿章、张之洞、端方几个，如程文炳者，不仅有这方面的言论，而且有“走出去”的行动。他派三个儿子带着“侦察敌国国情”的明确目的去日本考察数年的做法，在当时实为远见卓识之举。通过“大”与“小”对照，方知“睁眼”之为，是上下同求的一种时代思潮，并非仅仅是“大人物”之孤见。何况许多“大人物”的大理论、大识见，常常来自基层，来自小人物小事件的“舆情”的启示或激发。足见小人物同大人物是连着时代血脉的，大事件同小事件在各自的时空定位上丰富着历史的宽广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地方人物才是社会的主体。

另外，顺便说一下：李兴武一贯重视并实践地方历史人物研究，紧接着程文炳，还有即将出版的阜阳本土教育家李宗棠（颍上人）和比林则徐稍晚并与之齐名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徐广缙（太和人）。即使是他此前所出版的《刘锜与顺昌保卫战》和《欧阳修与颍州》，顾名思义，也可看出他是以刘、欧二位在阜阳这个地方所作所为之史实作为主要内容来写的。

三、突破极“左”之单一论

“文革”中流行有一种谬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更反动。理由是贪官的“坏”，可以激化矛盾，使人们早一天造反，加速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清官爱民惠民之举，会缓和社会矛盾，人民就不会造反，不造反就不会推动历史前进。所以说清官是“补天”，是维护封建社会统治，比贪官更坏。一时间涌现出很多史学家大批包公、海瑞，甚至林则徐等，连篇累牍的史评史论铺天盖地。进而否定一切历史人物，一切帝王将相的极“左”思潮蔓延开来，历史成为一盆混沌浆糊。

其实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人物也是复杂变化的,不可一概而论。即如毛泽东虽然说过只有农民起义才是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可他也后来又重点提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都是“遗产”,都要加以研究,再后来更进一步结论道,凡是对人民对社会做了有利事情的人,我们都要纪念他。可见他也在“渐进”,从单一走向全面。

至于对程文炳也是如此。当初笔者一听讲李兴武在搞他的资料搜寻,当面说过此人曾镇压过捻军,是反动派一类人物不值得研究。现在读到这三本书,才了解程文炳的一生最长期、最光辉的作为是爱民:拒绝曾国藩对捻军俘虏的残杀命令;是惠民:倾其资财赈济灾民;是爱国:积极投入抗法、抗日之战,并遣子侦察敌国;他还高瞻远瞩地提出对日经济竞争论和抗击的持久论。

同时程文炳的研究也引起我们反思历史和历史人物研究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政治和学术领域的注意力几乎全部倾注在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单方面,集中出版过大量的歌颂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英雄人物的文史专著;而对另一个“阵营”人物的研究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海瑞罢官”还成为吴晗的罪证。于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片面的、单边的、残缺不全的历史。阜阳地区也是如此:当年留下的只是名闻全国的捻军歌谣、故事、戏曲、电影,却难以寻觅“对立面”的踪迹。时间到了新时期,才涌现出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和现在程文炳的名字,从而使历史逐渐恢复了它本来的真面目,人物得以还原到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学术研究的观念有了新突破,成果有了新收获,局面也有了新的开拓。

四、突破“家谱”之反动论

家谱、族谱及个人年谱,其来源比地方史更远,上可推黄帝时期的《世本》,东汉尤盛。目的在“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学承

家,恩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它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由家庭延展到社会各个层面,具有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和民族教育、家庭教育、思想品德、文化艺术教育诸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它是和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往往是一个时代的具象缩影。又由于它所记录的家事人情,直接来自现实生活和人生实践,常被人们用来作为教育后世的镜鉴,其中许多积极健康的内容,值得后世学习。一些家规家训格言隽句,传至广大社会而历久不衰。象明代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中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之类家喻户晓。著名的钱氏家训,虽只有635字,却涉及有个人、家庭、国家多方面的训勉。比如家训中关于个人修身:“读经传则根底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关于家庭:“聚媳求淑女,勿计嫁奁。嫁女择佳婿,勿计富贵。”关于交友:“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救急,排难解纷”等等。这个家族人才辈出。据统计,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一类钱氏名人就有100多位。像人们熟知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岂止是家族之榜样,也是国家之瑰宝,人类之精英。他们成长的因素中,固然有基因的传承,社会环境的条件,但良好“家教”的作用应是重中之重。因而,温家宝总理尤其赞赏其家训中“利在一身无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的格言。

但自“打倒孔家店”以来,家谱被视为封建余孽,像污水一样被泼掉。及至阶级斗争越演越烈,又被定为反动的“变天账”。到了“文革”还进行了全面的大剿灭,从此销声匿迹。比如我们阜阳欧阳修后裔的家谱在“文革”中是被水淹了,还是被火焚了,至今下落不明。

然而,大学历史系出身的李兴武却深知家谱、年谱的重要性,知其是历史人物研究常用的方法,不可或缺。所以,他在自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事刘锜、欧阳修研究时,就坚持在他的著作中列入年谱专章,此举最少在阜阳是首发之作。今天,出版这部长达20余万字的《程文炳年谱》,不论是在字数上或在内容上都有新的“补充”。尽管年谱的内容都是依凭固有程式的传承,散见于各类文集杂记中资料的汇集,但李兴武更注重在亲历亲闻的实地考察。数年来足迹所至:从程文炳的出生地安徽阜阳、到他履职任所:安徽当涂、湖北襄樊、陕西汉中、福建泉州、河北张家湾、安徽安庆,直至他的墓地安徽寿县白鹤山。他不畏辛劳,跋山涉水,获取到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信息,更有许多珍贵的书法墨迹、照片图表,都充实在《年谱》中。

在《程文集年谱》“历史上程氏名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族千百年来也是人才济济,名人辈出,传承有序。其中有:中国传入西方的第一部戏曲之作,时下被拍成电影引起热议的《赵氏孤儿》,就是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文臣程婴的事迹;家喻户晓的隋唐瓦岗寨农民起义名将程知节(咬金);北宋理学奠基人,“程朱理学”的领军人物,史称“二程”的程颢和程颐;清代《红楼梦》“程甲本”的执笔人程伟元等等。他们都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可见,每一个在国史中闪光人物的根,都深扎在族谱的“泥土”之中。

尤为可贵的是,通过《程文炳年谱》所表现出来的李兴武坚守的“不溢美,不隐恶”的治学原则。笔者早年曾参与过捻军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清王朝“正史”中看到的全是对捻军的诬蔑和歪曲,连张乐行的姓名,也要写成“张烙刑”。而在后来的捻军文史创作中,又矫枉过正反过来,对“对立面”的人物事件极尽丑化,对捻军自身存在的种种扰民、劫掠、自相残杀等行为也要极力辩解和掩饰,甚至有徒以“实录”之名,进行虚设假造的做法。而李兴武在“年谱”中,既如实记录下了程文炳救俘、爱民、抗法、抗日的情况,也毫不隐讳地逐年逐月逐日地如实记录下他

镇压捻军和双方战争厮杀的情况。所涉及到的人物,如清廷的僧格林沁、英翰、袁甲三、曾国藩、李鸿章等和捻军的张乐行、张敏行、张宗禹、任柱、赖文光等,也是有一记一,有二记二,绝不妄加增删或取舍。笔者认为,这种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秉笔实录”,正是我们提倡的历史唯物主义学术思想的具体体现,值得借鉴和学习。

2011年10月30日于颍州

(陆志成,73岁,现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陈登科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阜阳市政协特邀文史委员)